

留学生群体分化

与社会思潮演变

(1915—1928)

王中平 著

LIU XUE SHENG QUN TI FEN HUA
YU SHE HUI SI CHAO YAN BIAN

《新青年》与留学生群体的趋新态势
留学生群体从「主义」之争中分化
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与留学生群体的再度分化
巩固中的马克思主义留学生群体
重建自由主义留学生群体的努力及其曲折

中国现代思潮的演进与留学生群体在思想界所起的作用有着直接的关系。留学生作为学习西方的代表,以自由主义为其基本共识,在民国初年以后逐步成为一个思想性群体,并走上了思想文化的舞台,领导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所引发的西方分裂的大语境下,留学生群体随着所学习的“西方”的分裂而出现分化的趋势。于是,一部分的留学生引进马克思主义,正在酝酿着走“以俄为师”的道路;而另一部分留学生虽然发现西方世界处于深刻的变动之中,但仍然坚持学习传统的西方。

吉林人民出版社

留学生群体分化

LIU XUE SHENG QUN TI FEN HUA
YU SHE HUI SI CHAO YAN BIAN

与社会思潮演变

(1915—1928)

王中平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留学生群体分化与社会思潮演变:1915~1928 / 王中平著.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11

ISBN 978-7-206-08185-9

I. ① 留…

II. ① 王…

III. ① 留学教育—研究—中国—1915~1928

② 社会思潮—研究—中国—1915~1928

IV. ① G649.29 ② D09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21557号

留学生群体分化与社会思潮演变:1915~1928

著 者:王中平 封面设计:孙浩瀚

责任编辑:陈亚南 责任校对:李蕊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吉林省显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20mm×1000mm 1/16

印 张:17.25 字 数:210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8185-9

版 次:2011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1000册 定 价:3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摘 要

中国现代思潮的演进与留学生群体在思想界所起的作用有着直接的关系。留学生作为学习西方的代表，以自由主义为其基本共识，在民国初年以后逐步成为一个思想性群体，并走上了思想文化的舞台，领导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所引发的西方分裂的大语境下，留学生群体随着所学习的“西方”的分裂而出现分化的趋势。于是，一部分留学生引进马克思主义，正在酝酿着走“以俄为师”的道路；而另一部分留学生虽然发现西方世界处于深刻的变动之中，但仍然坚持学习传统的西方。

以李大钊等为代表的留学生在“五四”后引进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现代思想言说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同时也使留学生群体进一步出现分化的趋势。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留学生群体正式分化出两个新的留学生群体——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留学生群体和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留学生群体。由此可见，“主义”的差异是留学生群体分化的本因，而“主义”之争则是留学生群体分化的重要表征。当然，留学生群体在分化过程中，分化出的各个新群体在思想上固然显现出差异性，但思想上原有的联系并未完全割断。

其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也得到部分留学生的支持，这部分



留学生进而逐步地形成了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留学生群体。由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有可能使中国传统思想以新的面目复活，于是当时的思想界出现马克思主义留学生群体和自由主义留学生群体迎战东方文化派的局面。后“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存在着对西方文化失望的情绪，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也就有一定的市场，留学欧美回国后的一部分留学生创办《学衡》杂志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又由于部分留学生加入文化保守主义阵营，因而以留学生为主体力量的文化保守主义此时呈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并具有独特的思想特征。

马克思主义留学生群体形成以后，在社会主义论战中得到巩固，并在中国现代思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社会主义”在后“五四”时期曾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不少新思想多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出现。以张东荪为代表的一部分留学生原属“五四”时期这样广义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分子。由于西方思想的影响和后“五四”时期中国思想演变的中国化趋势，社会主义论战得以发生。从社会影响而论，社会主义论战排除了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者，使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分子更加团结起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留学生群体得到巩固和扩大，这一群体以陈独秀、李大钊、李达、陈望道等为领袖。也正是通过社会主义论战，中国马克思主义留学生群体在中国现代思想言说中逐步居于中央的位置，马克思主义也从新思潮的一个流派发展为中国现代思潮的主体力量，并具有鲜明的思想特征。

自由主义留学生群体形成以后，胡适力图恢复早期《新青年》的自由主义理念，团结坚持自由主义的留学生，于是创办《努力周报》，重建自由主义留学生群体。在此期间，发生了陈独秀与胡适的论争，也发生了“科学与人生观”论战，这对中国自



由主义留学生群体以及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的演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努力周报》之后，胡适等归国留学生又创办了《现代评论》，吸收新近从欧美回国的留学生，不断聚集那些坚持自由主义的分子。胡适重建自由主义留学生群体的努力经历了许多曲折，但中国自由主义留学生群体一直葆有自己的思想特征。

留学生群体的分化使得《新青年》时期的精神统一与学习目标一致的群体变为多个群体——中国马克思主义留学生群体、中国自由主义留学生群体以及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留学生群体，并且各个新的群体拥有独立的话语系统和思想追随者。这样，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就构成了后“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的三大现代思潮。就后“五四”思想界的情形而言，这三大现代思潮都显现出现代性特征（尽管各自所具有的现代性的强弱有所不同），并且在思想界处于相对独立的位置，这对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尤其是思想发展的进程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从中国现代思想演变的历程来看，“五四”时期留学生群体的分化与中国现代思潮的演变有着密切的关联。

自序

我对近代中国的留学生发生兴趣，是在世纪之交。从2002年起发表第一篇留学生研究的论文，至今也有10年了。这10年中，我发表了近代留学史相关的学术论文外，完成了《留学生群体分化与社会思潮演变（1915—1928）》硕士论文。2010年，我以这篇硕士论文为基础，申报江苏省教育厅项目，获得通过。于是，我这两年的主要精力，也就是在完成这个课题方面。因而，也就有了这本书的出版。

对于近代中国社会来说，留学生是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是近代中国社会演变的产物。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我们国家派出的留学生很少，大多数的情形是其他国家派人到我们国家留学。原因很简单，中国长期以来文化水平较高，远远走在世界的前列，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世界中心。相应地，在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中也就有“华夏中心论”，不可能形成到国外留学的热潮。但是，中国进入近代以后就不同了，我们处于世界的边缘，而西方成为世界的中心。在此情形下，向国外派遣留学生也就理所当然了。由此，我们今天研究近代以来的留学生，就要在近代中国社会之中来研究，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来看待留学生这一新鲜现象。我的看法是，近代中国社会演变的过程中出现了留学现象、产生了留学生，而留学生一旦成为一个群体、特殊的社会阶层，又进而



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

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的留学生，可能还要研究那时人们在留学生问题上的社会观念。现在，人们对归国的留学生评价较高，“海归”成为归国留学生的代名词，这大致都是在褒义上使用的。现在社会上的各种人才招聘，尤其是对于“领军人物”的招聘，大都要求有“海外经历”。可惜的是，在容闳、严复生存的时代，“留学”的经历往往注定了其不能进入政治舞台或其他重要的岗位。不然，严复回国之后也就不要专门去学习桐城派古文，并先后四次参加科举考试了。但在清末，政府还是想提升留学生地位的，因而在清末也就有对归国留学生进行考试，出现了“赐同进士、举人”的现象。进入民国社会，社会风气已有很大的改观，留学生的地位大致有着上升的趋势。那时，具有留学经历的知识分子在初次相见时，往往在寒暄之后问上一句“先生是哪一年回国”的话，这表现了知识分子之间具有身份认同的心理，与当时的社会心理变化也有着密切的关联。这说明，留学生的具体活动是一回事，人们对留学生的观念如何又是一回事，但两者是有密切联系的。自然，观念层面也是比较复杂的，即使在知识精英阶层，也不全然是对留学生抱有好感。譬如，曾有三次留日经历的陈独秀，在《学生界应该排斥底日货》这篇“随感录”中，就说过“这种浅薄的自私的国家主义爱国主义，乃是一班日本留学生贩来底劣货”这样的话。我们今天研究近代中国的留学生，对于那时人们关于留学生的观念，可能也是很重要的研究内容。

研究近代中国社会中的留学生，需要选择一定的领域来进行，并且要注意到这一群体的复杂性。实在地说，留学生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演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都有他们的身影。因而，需要从各个领域加以全



面地研究，这是没有疑义的。但在笔者看来，由于留学生是新型的知识分子，因而他们在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学术领域里的影响也就较大一些，因而在研究之中也就需要突出这样的重点。这也是本书选择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范围内，研究留学生群体分化与社会思潮关系的重要依据。自然，在思想文化领域来研究留学生，也要看到留学生是一个阶层而不是一个阶级，在思想方面也就有着缺乏独立性的一面，因而在现代思想体系中，不仅有主张马克思主义的留学生，而且有主张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的留学生。这是因为，留学生归国之后，就与中国社会结合在一起，与社会上各阶级的意愿与要求联系在一起，可能也就有着“中国化”的情形而最终成为某个阶级的代言人。这就要求我们，在选择既定的领域开展研究工作时，始终要有社会史研究的眼光，密切联系近代中国社会的实际，要注意留学生这一群体在中国社会中的复杂性与变动性。

研究近代中国的留学生，需要站在时代的高度，汲取当下社会的新观点、新理念，这可能是今后研究工作的关键。研究历史需要不断地搜集资料，这是史学研究的常识。推动研究工作的深入，史料的搜集是最基本的功夫。然而，史料终究是有限的，而且史料也只是历史的遗留物，不可能完全保存所有的历史信息，因而单纯地依靠史料来深化研究也就有很大的难度。在笔者看来，由于历史具有演变的连续性特征，现实是未来的历史，历史是过去的现实，过去、现在、未来总是一脉相承的。因而，当下的社会现实、当下的时代观念及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切文明成果，对于我们理解过去的那段历史，可能有很大的启示与借鉴作用。从研究工作的实际出发，研究者的观念的创新、思想意识的提高，对于我们解读既有的史料有着极端重要的意义。就研究近代



中国的留学生这项工作而言，研究者需要有更多的现实关怀，不仅需要关注我们这个时代的留学生及留学现象，而且需要汲取我们这个时代的观念，建立一个与现实密切相联的话语体系，这也许能够使既有的留学生史料呈现出新的意义，从而为研究工作开辟一条新路。

时代在发展，历史在延续，学术在创新，任何研究工作都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理性地对待近代中国的留学生这一群体，按照历史实际展示近代中国留学生的形象，这是我们在研究中应该恪守的信念。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于学术研究者来说，不仅需要关注时代的变迁，建立起现实与历史相联系的观念体系，而且也需要内心的宁静、不为外物所动的信念，更需要有对待研究工作的平常之心。我时常想起学界的一句名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但愿这句名言，在现今的知识界能颂扬下去，不致被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们所忘记。

王中平

2011年7月25日

导 论

先进的中国人学习西方，是五四时期中国社会、思想、学术方面发展的基本表征。“西方”是一个变动的“文本”，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而引起西方分裂的事实，则使这一“文本”表现出多个面相^①。“先进的中国人”大致主要是思想文化界的知识精英，落实到具体的层面则主要是留学生群体。按照罗荣渠的说法：“清末民初之时，学习西方的主力转到大批出洋的留学生身上。他们亲自接触到一个广阔的新世界，才对中国的落后状态有真切的认识，并怀着极大的热情理解西方的历史与文化，并与中国相比较。这样，那几千年的封建体制和儒学道统才在他们的眼前彻底动摇了，开始崩溃了。只是在这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西方的认识才提高到一个新水平。”^②按照笔者的认知，到五四时期，这一学习西方的“新水平”又有重大提高；而且由于西方分裂也使五四时期学习西方的留学生群体产生分化，其结果是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和中国自由主义两个思想流派，其后由于部分留学生加入文化保守主义营垒也使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强化了力

① “西方的分裂”是罗志田先生提出的研究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的概念（参见罗志田：《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成功地解说了五四时期中国思想演变的外部背景。本书的某些观点受罗先生学术见解的启发，特此说明。

②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6页。



量，这对后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的思想与学术产生重大影响。下面拟将学术界关于近代中国留学生研究的状况以及与本书一些相关的问题，作简要的交代和说明。

一、学术界关于留学史研究的状况

1. 关于近代中国留学生的总体性研究情况

一是对留学运动的历史事实的梳理和评述，如：舒新城的《近代中国留学史》（中华书局 1927 年版）、张洪祥，王永祥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版）、李喜所的《近代中国的留学生》（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黄新宪的《中国留学教育的历史反思》（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王奇生的《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林子勋的《中国留学教育史》（1847—1975）（华冈出版有限公司 1976 年版）、[日] 松木龟次郎的《中国留学生教育小史》（东亚书房 1931 年版）、[日] 实藤惠秀的《中国人日本留学史》（三联书店 1983 年版）、[日] 周一川的《中国女性日本留学史研究》（图书刊行会 2000 年版）、[美] 廷斯曼（Tipson Marilyn）的《中国及其归国留学生史》（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美] 叶伟丽（Ye Weili）的《1900—1927 年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米镇波的《赴苏俄留学述略（1925—1930）》（《党史纵横》1988 年第 4 期）等。

二是关于近代归国留学生对中国社会贡献的研究，如：田正平的《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



李喜所的《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周棉主编的《留学生与中国的社会发展》（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安宇等主编的《留学生与中外文化交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版）、[美]李又宁的《华族留美史：150年的学习与成就》（纽约天外出版社1999年版）、汪一驹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留学生与近代中国（1872—1949）》（枫城出版社1987年版）、黄知正的《五四时期留美生对科学的传播》（《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曾昭顺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及其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河北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张德鹏的《中国留学生与祖国的历史命运》（《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李喜所的《中国留学生与五四运动》（上、下）（《神州学人》1999年第5、6期）、姜新的《评清末民初的留学生归国考试》（《史学月刊》2005年第12期）、姜新的《留学欧美人士与中华民国的创建》（《民国档案》2002年第4期）等。

三是对留学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如：清华大学编写《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贺培珍《留法勤工俭学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陈学恂、田正平等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的《中华民国档案史料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周棉主编的《中国留学生大词典》（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王焕琛编录的《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国立编译馆1980年版）等。

综观学术界对留学生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对历史事实的梳理和评述，以及就留学生对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贡献所作的研究，注意到留学生的留学经历对其归国后从事各种活动的影响。此外，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关系也是近



年来研究的重要课题；著名留学人物的研究、区域留学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些研究成果表明，中国近代留学史的研究得到进一步深化。但是，中国近代留学生的研究依然存在较大的空间，一些新的问题还急待深入探讨，譬如留学热潮何以在近代中国产生？近代中国社会为留学生发挥作用提供了什么条件、存在什么障碍？留学生如何介入到中国社会？留学生群体如何演变？对于当时的时代思潮有何影响？又譬如，留学生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关系，留学生与中国的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国共军事大决战的关系的研究，这方面的成果还很少，因而留学生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关系的研究也是重要的研究课题。

2. 关于留学生群体研究的具体情况

一是关于留学生群体划分问题的研究。学术界开始注意到留学生群体的划分问题，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的大多数学者，一般都是按照留学的国别将中国 1840—1949 年的留学生分成留日学生、留美学生、留欧学生、留苏学生，这可能是研究者出于对留学生所拥有的共同留学经历，以及其与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种种不同来考虑的。这样的划分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也有值得深入研究和分析的地方。此外，由于各位学者的研究视角不同及其所主张的标准多样化，因而到目前为止又产生了多种不同的划分办法。譬如，有的学者先将我国的留学运动划分阶段，然后再根据留学的国别把我国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为止的留学生划分为多个小群体，代表性的成果如周棉撰写的论文《近代中国留学生群体的形成、发展、影响之分析与今后趋势之展



望》，认为“留学运动经过了八个阶段，形成了22个小群体”。又譬如，也有学者以留学生的共同生活为依据来划分留学生群体，如毛俊萍等撰写的《清末留日学生译者群体的文化取向》，将从事于译介西书的留日学生归入留日学生译者群体，并对他们的文化取向加以研究；李克英撰写的《留学生群体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则将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发生发展过程中的留学生作为群体进行分析。再譬如，有的学者将从事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归国留学生作为一个群体进行研究，代表性的成果有李里峰撰写的《中共中央领导层中的留学生群体分析（1921—1949）》，将中共中央领导层中的留学生群体按留学的地域分成留美群体、留日群体、留欧群体；马启民撰写的《20世纪前半期中国共产党人留学生群体研究》，对20世纪前半期中国共产党人中的留学生进行细致的分类，将这一群体依照时间的先后细分为四代留学生群体，即：十月革命前的留学生群体（1900—1917）、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期的留学生群体（1917—1923）、第一次国共合作至土地革命初期的留学生群体（1923—1931）、土地革命战争中期至全国胜利时期的留学生群体（1931—1949）。

二是关于留学生群体特征问题的研究。学术界对留学生群体的特征有所研究，初步注意到群体外在的共同性，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如马启民撰写的《20世纪前半期中国共产党人留学生群体研究》一文，概括了20世纪前半期中国共产党人留学群体的共同特征：第一，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锻炼成为具有高度觉悟的共产主义战士；第二，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不少留学生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翻译家、宣传家、教育家、军事家；第三，对外部世界的洞察和了解，形成了具有广阔视野的世界眼光；第四，部分留学生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影响



下，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教条主义的代表。有的学者具体分析
了共产党领导层中留学生群体的具体特征，如李里峰在《中共中央
领导层中的留学生群体分析（1921—1949）》中，对中共中央
领导层中的留日、留欧、留苏群体在1921—1949年间的不同特征
进行了分析，认为留日群体的特征是年龄较大，留学时间较早，
家庭状况较好，文化素质较高；留欧群体的特征是人数较多，年
龄相近，籍贯相近，大多出身贫寒；留苏群体的特征是大多数在
留苏之前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甚至已加入了共产党，是作为革
命领导人才的培养而留学苏联的，在留苏时接受了组织训练和思
想训练。林辉撰写的《近代中国留美学生群体的研究》，从性别
结构、年龄结构、地域分布、家庭背景等方面专门研究了近代留
美群体的特征，认为留美学生群体在性别结构上，早期几乎全是
男性，只是甲午战争后赴美留学的女性才渐渐增多，但女性总体
所占比例还很少；在年龄结构上，留美学生一般都是年轻人，有
一个从十多岁为主逐步过渡到二十多岁为主的发展过程；在籍贯
分布上，留美学生的地区差异很大，大多数来自于现代化起步较
早、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思想较为开放的东南沿海省市；在家庭
出身方面，早期的留美学生一般来自较为贫寒的百姓家庭，20世
纪初留美学生则主要来自社会的中上层有文化、富裕的家庭。毕
晋峰在《近代留学的中科院科学技术部院士群体状况分析》一文
中，对具有留学背景的中科院科学技术部院士性别、籍贯、国内
毕业院校、留学国别、留学院校、留学专业、国外毕业时间等进
行统计分析，以寻求这一特殊的留学生群体的种种表征。台湾学
者胡平生（台湾大学历史学教授）在长庚大学增进学生的人文社
科知识的演讲中，认为中国近代留学生群体的特征是：第一，留
美学生群：出国时，基础扎实，选拔严格；留学中，教育正规，



学有所成；回国后，人才辈出，成就斐然。第二，留日群体：出国时，条件宽松，成分复杂；留学中，境况独特，多学少成；回国后，文武兼备，良莠不齐。第三，留欧学生群体：出国时，渠道不一，类别各样；留学中，国情各异，学风多极；回国后，所涉广泛，各有所长。第四，留苏学生群体：出国时，选派为主，目的明确；留学中，侧重培训，讲求实效；回国后，多居上层，位高权重。

三是关于留学生群体作用的研究。把留学生作为一个群体来研究，并剖析这个群体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这样的论述有一些，但数量不多。譬如，周棉撰写的《留学生与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一文，认为留美幼童为传播西学、传播中华文明作出了贡献，掀起了中国留学教育的第一页；福建船政学堂赴欧学生引进了西方的造船、采矿、海军等方面的技术，翻译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促进了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留日学生创办杂志，译介西说，创办新式教育，积极参加政治运动。李里峰在《中共中央领导层中的留学生群体分析（1921—1949）》中，运用比较的方法对中共中央领导层中的留学生群体（1921—1949）的作用作了具体的分析，认为留日学生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贡献甚巨；留欧学生群体主要在实践中了解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中共领导层中最坚韧的一股力量；留苏学生是中共领导层中最庞大的群体，但是长期存在的内部矛盾和路线斗争削弱了他们在党内的影响力。李克英撰写的《留学生群体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认为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发生发展过程中，留学生群体起着先锋、媒介、启蒙者和领导者的作用。

概而言之，学术界对于留学生群体问题的研究所取得的成绩